性别数字鸿沟视角下的数字就业赋权县域女性发展

佟　新　梁　萌　陈　龙

［摘　要］　本文聚焦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就业助力欠发达县域女性的发展、推动弥合性别数字鸿沟的项目实践及其影响。在数字鸿沟既有的可及性和使用性直接影响的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数字就业项目的直接目标在于弥合性别数字鸿沟，从就业和经济角度直接推动县域女性发展，更在社会资本、家庭性别分工、主体意识等层面产生间接影响，是全方位助力女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此成效并非传统意义上仅从技术或经济维度着手的数字就业、创业策略所能达到的，而是需要将性别与家庭友好等积极的工作文化和管理模式整合到数字就业中，也有必要成为性别数字鸿沟弥合的实践、研究与政策的核心维度。

［关键词］　性别数字鸿沟；数字就业；县域女性
DOI:10.13240/j.cnki.caujsse.20250827.001

一、数字经济时代女性如何跨越性别数字鸿沟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妇女面临的性别不平等境况在逐步改善。但是，以数字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数字化发展，使得以上成果面临新的挑战。这主要源于数字技术的两面性：一方面，传统社会中的性别偏见依然深深嵌在技术发展中，因此数字产品、设备、服务等都有可能将现实世界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放大，从而产生性别数字鸿沟；另一方面，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数字技术是数字社会中增强妇女权能的重要途径，因此提升妇女的数字素养与技能不仅有利于提高其经济社会的参与能力，而且有利于保障和健全妇女权益，真正彰显妇女的主体地位。

基于以上事实，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妇女的数字化发展。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要》开始关注并强调技术发展对妇女可能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县域青年的地方性数字劳动研究”(24BSH068) 。
［作者简介］　佟　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梁　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陈　龙，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产生的影响,指出“技术正在迅速改变世界,也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十分有必要的是,妇女不仅从技术中受益,而且要能参与从设计到应用、监测和评价各阶段的过程”①。2015 年,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 17 个发展目标,其中第五个目标是“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儿童的权能”,并将这一目标的内容具体化为“加强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增强妇女权能”②。2023 年 3 月,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7 届会议就优先主题“数字化时代的创新、教育与技术变革 · 推动实现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与女童”通过《商定结论》,强调优先考虑数字公平,缩小性别数字鸿沟,具体措施包括利用融资促进包容性数字化转型和性别变革创新,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数字和科学技术教育,以及促进妇女参与、就业和领导技术和创新等方面③。我国政府在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的宏观策略基础上,面对数字技术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于 2021 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 》中,在关于妇女与环境领域的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 全面提升妇女的媒介素养,提高妇女利用信息技术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④。这再次突出了妇女在数字社会中参与信息技术的重要性。

近年来,妇女在数字经济中的参与程度明显提升,特别是在我国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广泛普及的现实情况下,主要聚焦数字技术的使用性方面,表现在: 一方面,提供支持和资源激励妇女的创新创业精神和领导能力,将女性聚集的中小微企业列为促进妇女经济赋权的重要目标之一; 另一方面,作为网络用户的女性网民参与有显著提升,2022 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女性网民数量逐年提升,当前男女网民的比例为 51. 5∶48. 5,与中国总人口的性别比例基本一致⑤。此外,在就业方面,《2021 年抖音女性创作者画像洞察报告》指出,该平台中短视频创作的女性人数是男性的 1. 52 倍⑥; 滴滴发布的《滴滴数字平台与女性生态研究报告》显示,2021 年国内新增女性司机 26. 5 万,2014—2021 年全球

---

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1995 年 9 月 4—15 日,中国北京,https: //www. un. org/zh/conferences/women/beijing1995。

② 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https: //sdgs. un. org/zh/2030agenda。

③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7 届会议正式开幕,了解关于委员会的五大要点,https: //news. un. org/zh/story/2023/03/1115847。

④ 男女平等 儿童优先——解读《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 》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 - 2030 年) 》,https: //www. gov. cn/zhengce/2021-09/28/content_5639716. htm。

⑤ 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 //www. cnnic. cn/n4/2022/0401/c88 - 1131. html。

⑥ 2021 抖音女性创作者画像洞察报告: 看见“她”力量,https: //www. dydata. io/datastore/detail/2082742004537757696/。

共计 271. 5 万女滴滴司机获得收入①。政府相关举措和企业的具体数字表明,中国在促进妇女跨越数字鸿沟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果。

但同时也需要看到性别问题的交叉性和复杂性,如偏远地区女性、贫困女性和女性基础劳动力等群体仍然在可及性和使用性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数字鸿沟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推进数字化社会中的性别平等,不仅要关注女性创业者和创新者,还要关注社会底层和边缘女性。

基于这一共识,围绕促进欠发达县域妇女数字经济劳动参与的问题,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蚂蚁集团、蚂蚁公益基金会等联合发起“AI 豆计划”人工智能产业孵化项目(简称“AI 豆计划”) 。该项目于 2019 年 8 月启动,在全国建立 17 个数字就业中心,致力于通过人工智能产业助力县域女性发展。这一县域数字就业项目与传统的扶贫车间不同,其根本目标是促进县域女性发展从而提升非贫困家庭的收入。由于数字工作的特点,就业主体为回流县域的中高学历待业女性青年,特别是从城市返回县域承担家庭照顾责任的已婚已育的青年女性。同时,项目的启动、前期运营主要由政府和公益组织协作指导,提出了逐步由公益运营向市场化运营过渡的发展策略,因此该项目得以在引进数字产业的同时建设了与数字就业相关的性别友好、家庭友好的企业文化和工作环境。

目前,数字就业中心的工作岗位主要包括数据标注和云客服两大类。数据标注员每天的工作是对图片、视频、文本等数据进行拉框、标点等操作。因此她们也被称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她们的工作类似于人工智能的“老师”,通过为数据贴标签的方式让 AI 机器人更容易识别数据,进而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以数据采集和标注作为主要任务之一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在 2020 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成为一种正式的全新职业。云客服员每天在线处理买家与卖家的咨询和投诉业务,工作是一种远程办公模式。上述两类跨时空的数字就业方式为欠发达县域女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意在通过对欠发达县域数字就业女性群体的就业、家庭、职业发展、社会网络等多方面情况的梳理,进一步澄清和讨论数字就业项目在促进女性发展、弥合性别数字鸿沟方面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政策意涵。

二、研究方法

课题组成员均致力于技术与性别发展的议题,并关注到近年来县域数字就业发展的迅猛势头,特别是其中以促进数字就业赋权县域女性发展的公益运营模式,因此课题组于 2022 年 5 月到 2023 年 2 月到 8 个欠发达地区的县域数字就业中心进行了

① 滴滴发布女司机数据: 2020 年新注册女性网约车司机超 26. 5 万,http: //finance. people. com. cn/n1 /2021 /0308 /c1004 – 32045925. html。

调研。项目主要访谈对象的特征包括年龄在 18 ~ 35 岁、具有初中或大专以上学历者,即县城“90 后”和“00 后”。由于该数字就业项目主要聚焦为欠发达县域女性提供数字就业机会,因此访谈对象主要是青年女性,她们大多是大学毕业返县就业的女大学生和在县城抚育子女的已婚女青年(项目也称该群体为宝妈) 。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AI 豆计划”已经在陕西清涧、陕西子洲、陕西宜君、山西永和、宁夏银川、贵州万山、山西朔州、贵州遵义、甘肃积石山等 17 个县(市) 落地,招募工作人员 1 678 人。2023 年底,课题组再次走访其中两个项目点,发现这两个地区数字就业的女性人数较上一年增长了 3 倍,并在这些欠发达地区形成了有规模的产业优势。

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一是历经多轮试调查形成电子问卷,通过“问卷星”发放到数字就业中心,由中心相关负责人协助发放,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1 097 份。其中,数据标注从业者为 62. 6% ,平台客服从业者为 37. 4%; 女性从业者为 70. 2% ,男性从业者为 29. 8% 。这一数据基本涵盖了数字就业中心的全部女性从业者。二是用半结构访谈和焦点小组座谈的方式收集从业者个人工作史和生活史,共计访谈 123 人,其中女性为 110 人。

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 第一,关注欠发达县域数字就业女性的现状,特别是具有中高教育背景的青年群体; 第二,对欠发达县域女性数字就业的特征进行梳理,并集合相关性别数字鸿沟的理论讨论和实践探索,关注数字科技的发展带给欠发达县域女性发展和赋权的多种可能性。总之,研究围绕县域女性参与数字就业的项目,分析县域数字就业从业女性的状况和基本特征,展示其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形成自我认同和行动策略,最终探讨数字就业对女性发展的全面影响。

三、相关研究回顾

(一) 县域女性的流动与发展

1. 工业时代拆分式再生产与女性返乡

在工业化时代,对县域女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研究议题上,这些看似是对农民工的研究,但其主体主要是男性。农民工个体的打工生命历程和家庭的生命周期紧密相关,城乡二元结构的内涵是城市与乡村就业机会的差别和社会异质性(张世勇,2013)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打工青年在进入城市后甚至是在城市中生活多年之后,发现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也无法再认同农村,成为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双重边缘人”(王春光,2001) 。

21 世纪初对“打工妹”的研究发现,她们以年轻未婚女性为主,从封闭的农村进入相对开放的城市,从传统农业进入现代化工业的工厂工作,形成了特定的人生经历,在众多方面改变了她们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轨迹,特别是她们的婚恋观和婚恋行为

(风笑天,2006) 。谭深(2005) 的研究通过对打工妹情感的分析,进一步提出其在性、恋爱、婚姻中遭遇到各自不同的困扰,都处于不利地位。

有研究发现,先赋性的性别角色深化了底层农民工的不平等,将女性推向更为弱势的地位,她们有更为明显的“短工化”趋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a: 1 – 45) 。她们的经验深刻地嵌入在其生命周期中,与家庭、生育和抚育等紧密相关。有学者提出农村家庭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即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在家中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被分解开,其“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等安排交由他们在乡村的老家完成,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满足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需求,确保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将全球范围内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过来,推动中国迅速转变为“世界工厂”,并由此造成了农民工对城市和乡村的双向依赖。一方面,进城务工男性农民的农民身份被保留,无法获得完整的工人身份,却从事高强度生产和低工资待遇的工作; 另一方面,因其收入不高,不可能将孩子带在身边,因此其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劳动力更新部分不得不在农村老家进行,体现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特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 46 – 131) 。近年来的研究更发现,在女性流动上,大城市的推力和县域的拉力共存,大城市居住成本的不断攀升使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很难居住在环境条件好的社区中,剥夺了其在城市的归属感(马健囡,徐昊楠,2017) 。也由此,来自乡村的打工女性返乡发展成为个体生命历程和社会结构双重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而这一特点在历代打工女性群体中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了当下青年女性返县的重要原因。

2. 欠发达县域发展与县域女性

一方面,当女性群体回到县域发展,在个人禀赋和家庭资源分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她们发展的基础十分不利; 另一方面,县域女性的发展在中国式城镇化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 ~ 54 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65. 0%,其中 25 ~ 49 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70. 5% 。县域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如何呢? 以国家统计局在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为基础,中国的县镇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①,2020 年共有约 3. 2 亿人口。以 16 ~ 55 岁为界,其中共有约 1. 85 亿劳动适龄人口,其中女性约有 0. 91 亿,较男性少约 280 万。在县镇劳动适龄人口中,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56. 35%,男性劳动参与率为 76. 22%,两性差约为 10 个百分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县镇劳动适龄人口的人户分离比例

① 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https: //www. stats. gov. cn/sj/tjbz/gjtjbz/202302/t20230213_1902742. html。

较高,即流动率较高,占 42.74%。其中,男性人户分离比例为 43.02%,女性为 42.45%[①]。从表 1 可以看出,第一,两性因工作就业的流动皆占首位,男性有一半流动是因工作就业流动; 女性则有 1/3 以上的人口是因工作就业流动; 第二,拆迁/搬家带来的流动占第二位,说明快速城镇化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明显; 第三,女性因婚姻嫁娶、为子女就学、照料孙子女、随同离开/投亲靠友的流动比男性高,可称这些流动为因婚姻家庭需求的流动,加总起来,女性达 21.70%,男性为 8.88%。这说明在县城的人口中,女性因与婚姻家庭相关的流动占到 1/5 以上,比男性高了 12.82 个百分点。

表 1　2020 年中国县镇劳动适龄人口分性别流动原因　　单位: %

	男性	女性	总体
工作就业	50.71	37.59	44.29
学习培训	13.36	13.71	13.53
随同离开/投亲靠友	4.13	7.06	5.56
拆迁/搬家	19.95	19.76	19.86
寄挂户口	0.92	0.86	0.89
婚姻嫁娶	1.29	8.07	4.61
照料孙子女	0.38	1.34	0.85
为子女就学	3.08	5.23	4.13
养老/康养	0.14	0.20	0.17
其他	6.04	6.19	6.11
合计	100	100	100

注: 表中数据由潘修明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所得。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的产业结构转移和政策性的精准扶贫项目落地,曾经仅在东部和沿海地区的代工企业开始向中西部县域转移,县域返乡女性也因此可以获得在家乡就业的机会。此发展趋势给县域女性带来的影响存在两个方面的争议: 一方认为,县域女性在代工企业的就业,为其带来了显著的非农收入,且可以使其兼顾家庭照料; 另一方则认为,县域女性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劳动报酬,却是不稳定和不公平的,因为代工企业主要是市场化经营,订单来源不稳定,因此劳动收入也缺乏保证。同时以灵活用工为主的县域女性难以获得相关劳动保障,收入水平也远低于正规就业的产业劳动者,繁重的劳动给本就需要兼顾家庭的女性带来了额外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受益方可能是厂方、家庭,县域女性个体则需要面临压力、矛盾。

从二者的争论可以看出,传统的县域代工就业虽然突破了既有的地域藩篱,使女性实现了本地就业,但运营策略则主要是市场化的,双方都承认就业给女性带来了经

① 数据由潘修明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所得。

济收入,其绝对的经济水平有所提升,但在相对经济收益和社会影响方面则褒贬不一。实际上,以上争论并非针对事实层面的真假之辨,而主要是价值立场之争,是以县域家庭还是以县域女性为核心分析主体的问题。也即在某种程度上县域家庭获益并非天然意味着县域女性的个体同时获益,反之则不然。这也提醒我们,以女性为主的就近就业,虽然可兼顾家庭和工作,但却不必然促进女性发展。

县域女性劳动参与状况可总结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县域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全国城镇平均水平,至少低 10 个百分点; 第二,县域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有差异,两性劳动参与率之差约有 10 个百分点; 第三,县城女性劳动参与率有较高的流动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与婚姻家庭需求相关的特征; 第四,县域女性就业并不能必然促进女性发展和赋权女性。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县域女性返乡承担家庭再生产责任的同时也有很大可能使自身在家庭和社会双重意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边缘位置。

总体来看,在拆分型家庭策略和县域女性流动性与家庭高度相关的特征下,一方面,县域是现阶段乡村女性必将回归且肩负家庭责任的地方; 另一方面,县域女性也存在就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与目标,但传统的产业、单一的市场化运营目前仍不能满足县域女性的发展需求。

(二) 数字鸿沟概念与欠发达县域性别平等议题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概念指涉的是不同群体在数字技术可及性和使用性方面所存在的差距(Riccardiniand,2002) ,在智能手机大范围普及的当下,数字技术在不同群体的可及性差距被大大弥合,而在使用性维度的差距却随之凸显。学者进一步将使用技能的层次差异划分为工具技能、信息技能和策略技能(Dijk,2002) ,这三类技能在个体身上并非互斥而是可以叠加的,但在不同群体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中由现实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导致的性别间的数字技能不均衡,即为性别数字鸿沟。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入,特别是与实体产业的深度结合,学者们在这类技术可及性和使用性对人的直接影响的基础上,开始讨论其导致的社会后果,包括知识、经济和社会结构位置等。从这一角度来看,欠发达县域的女性数字就业实际上是在使用性方面推动了性别数字鸿沟的弥合,在技术的直接影响层面成果是明显的,但在更深入的社会后果方面仍然有待考察,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数字就业按照就业内容可分为数字产业化就业、产业数字化就业和数字化治理就业三大类。微观上,数字就业(digital employment) 是指围绕数字平台、借助数字技术、创造数字商品和服务的就业方式。历史地看,数字就业经历了信息化就业、网络化就业和平台化就业三个阶段。平台化就业是数字就业的重要形式,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平台规模和数字不断加大,主体不断增多,数字就业的空间越来越广阔。

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达 1. 91 亿个,占全年总就业岗位的 24. 6%①。到 2025 年,数字经济带动就业人数将达 3. 79 亿。有学者将数字就业分为四类: 一是传统雇佣经济领域下的数字劳动过程,二是互联网平台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动过程,三是数字资本公司技术工人的数字劳动过程,四是非雇佣形式的产消型的数字劳动过程。数字就业具有多元性和广泛性(韩文龙,刘璐,2020) 。而目前学界对县域数字就业特别是女性就业影响仍然所知甚少。

那么,数字经济落地欠发展县域是否能够赋权县域女性的发展? 特别是其中哪些特征促进数字就业超越了传统产业的经济影响、家庭责任为主的局限而扩展到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和促进女性发展? 以上问题是本文对数字就业相关项目进行分析时的核心关注。

四、欠发达县域女性数字就业群体特征

(一) 教育背景

根据本研究发放的问卷数据显示,县城返乡中青年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他们成为数字就业的主体。年龄上,男性从业者的年龄高峰是“90 后”,占 73. 4%; 第二位的是“00 后”,占 19. 3%; 第三位的是“80 后”,占 6. 7%; “70 后”只占 0. 6%。女性从业者的排序第一位和男性一样,即“90 后”,占 65. 5%; 第二位是“80 后”,占 24. 0%; 第三位是“00 后”,占 9. 2%; “70 后”占 1. 3%。女性的平均年龄为 29. 1 岁; 23 岁以上者占到 89. 5%。女性从业者“80 后”比例增加,即 30 ~ 40 岁组的女性参与数字就业的比例比男性高 14 个百分点。这可能与中青年已婚已育女性的状况相关。受教育程度方面,女性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初中只占 4. 5%; 中专、职高和普高占比达 30. 4%; 大专学历占 50. 8%;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14. 2%。大专以上学历者近 2/3,达 65. 0%。从业者中,男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其中 62. 4% 为大专,14. 7% 为大学本科及以上。

总体来看,县城新一代青年正在成为数字就业主体,他们大多是 1990 年后出生,受教育程度较高,基本上都是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并且全部有过外出城市打工的经历。也因此,该数字就业项目有针对性地招聘具备该特征的县域青年目标群体,以其中一个项目点的招聘广告为例,其招聘“数据标注师”要求: 第一,年龄在 18 ~ 35 周岁,贫困户、低保户,妇女、残疾人优先考虑; 第二,品行端正,遵纪守法,具有正常履行工作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服从公司安排; 第三,初中(含) 以上学历,能够熟练应用电子计算机,具备基本的语言阅读能力; 第四,从事过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 www. sohu. com/a/310325909_472878。

互联网行业或数据标注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云客服”的工作项目介绍是: 本次定向招募是专为 K 县青年提供的灵活就业机会。项目亮点: 兼职模式,计件制。时薪 15 ~ 30 元,通过培训即可获得 400 元公益补贴。上班时间自选,接受派班模式(时间段 8: 00—24: 00) 。上班地点自由,环境安静有网络有电脑即可(若居家条件无法满足,可提供统一场地) 。招聘条件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熟悉办公软件操作; 年龄 18 ~ 35 岁,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专业不限,金融、财务、会计类专业优先,有相关资格证优先; 擅用普通话表达,沟通和理解能力强、有问题分析能力; 能够接受电话客服工作模式,并保障月均 80 小时以上工作时间(日均 2 ~ 3 小时) ; 残疾人、女性优先。工作职责: 以语音形式解答用户在使用时遇到的业务问题。

(二) 职业生涯

本研究的问卷数据还显示,所有县域数字从业者都有在外工作的经验,且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女性中,在外打工时长在一年以下的占 38. 7% ,1 ~ 3 年的占 31. 0% ,3 年以上的占 30. 3%; 男性中,在外打工时长在一年以下的占 46. 2% ,1 ~ 3 年的占 33. 0% ,3 年以上的占 20. 8% 。

同时发现,数字就业中心工作的女性大多出生在 1990 年之后,不少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有着留守的童年经历。与上一代打工者不同,她们有着较高的学历,背负着家庭向上流动的希望,有在大城市的打拼和努力的经验。

但同时又在生命历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生育状况深深地嵌入在其职业生涯的历程和规划中。县域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乡土文化的影响,生育与养育是其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她们被期望婚后在家庭中照料子女、老人和丈夫。这种性别角色分工在数字就业中心的女性身上同样有所反映。这些出生于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乃至 2000 年前后的中青年女性,多数有在县域以外上学、就业或生活的经历,她们在生命历程的关键转折点,如就业、结婚、生育、孩子入学、父母需要照料时,返回县城就业和生活是其优先的发展道路。

(三) 就业动因——以家庭为先兼顾就业

从问卷数据来看,男女两性数字就业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婚育状况方面,女性从业者中有 62. 9% 是已婚,男性从业者则仅有 19. 9% 是已婚; 女性已婚者比男性高 40 个百分点。

从对已婚者的进一步分析看,其婚配具有同质婚的特点。男性配偶 75. 4% 为农业户口,24. 6% 为非农户口; 女性配偶 80. 2% 为农业户口,19. 8% 为非农户口。

从配偶的受教育程度看,男性的配偶 40% 为高中及以下,32. 3% 为大专,27. 7% 为本科及以上; 女性的配偶 55. 6% 为高中及以下,32. 2% 为大专,12. 2% 为本科及以上。在已婚女性中已生育者占 87. 4% 。

从工作安排来看,女性数字从业者中有 78. 3% 认同“自己职业发展和照顾家庭

两者兼顾”是择业的初衷; 有 11. 6% 认同“以自己的职业发展为主”; 有 10. 1% 认同“以照顾家庭为主”。也就是说与城市就业女性相比较,县城就业女性群体更加偏重家庭责任,不仅是家庭与就业兼顾,更是以家庭为先兼顾就业。

同时这些数据意味着县域数字就业为绝大多数女性(达 88. 0%) 承担照料家庭的责任提供了可能,满足了其对家庭的责任,以便顺利展开自身发展。并且其中家庭照料责任不仅包括照料和养育孩子,还包括对父母的赡养和照顾。

然而,虽然同为承担工作和家庭双重责任,从问卷调查和访谈材料来看,实际上县域数字就业的女性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工作和家庭兼顾型,占比最多。她们大多数是已婚已育者,数字就业中心不仅为其提供了经济独立的机会,还能使其兼顾照料家庭和子女。第二类是职业发展过渡型。她们以未婚女性为主,多有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或工作生活的经历,又因各种原因回到县城,但并不满意县城的生活质量,更不满意县城现有的工作。因此,本过渡型内部又可以分为三种过渡原因: 一是内心渴望寻找到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有机会时会再次进入大城市; 二是一心期待进入体制内工作,在不断地考县城体制内的工作; 三是以专职学龄前妈妈们为主,她们有计划在孩子上学后去到大城市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是以孩子需求为流动意义的群体。第三类是职业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型。她们的主要特征是受教育程度较高,有独立和自我发展的初心。她们可能是未婚者、已婚者甚至是已育者,但曾经接受过的教育和工作经历使其期望自己在数字就业方面有更长远的发展。一方面,她们对数字就业的未来充满信心与动力; 另一方面,她们不甘于现状,期待通过数字就业在新的平台谋求企业内部的晋升,期待给不甘落后的自己和平淡无奇的生活带来焕发生机的改变。这三类职业发展类型并非非此即彼的,因某种契机可以相互转换,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认为女性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份工作”。而同时当被问及“如果家庭与职业发展发生冲突时,你会如何抉择”时,几乎所有的女性被访者都选择“以家庭为重”。反映出县域女性以家庭为先兼顾就业的职业发展观念。

这种职业发展观念则进一步显示出与工业时代流动女性应对拆分型家庭策略的返乡实践的延续。对改革开放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研究表明,城市化过程和城乡差距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的工作和生活。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在此过程中,大量年轻的农村男女流入城市,进入各类加工厂、开启异地打工生涯,或者从事家政等服务性工作。第一代女性农民工约占全体农民工的 30% ~40% 。这些女性在全球跨国资本、户籍制度、家庭父权体制的压力下,在工作场所中遭受身体和话语的规训,受到基于性别、年龄、城乡、地区性差异等多方面的歧视。她们很难在城市中获得长久居住的身份,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和权利,这使她们难以形成对城市的认同,陷于一种“回不去、落不下”的境地。即使经由婚姻在当地永久落定,女性农民工也难逃“双重外来者”(非本地人、非夫家人) 的身份感知(谭琳等,2003) 或“候鸟型的打工人”的境况(王春光,2001) 。从再生产的视角出

发,有研究认为,乡村女性通过“夫妻拆分型”打工模式来应对生育和养育的难题,她们在生育和养育的生命周期中成为留守妇女。工业化时代,城市与乡村社会就业机会的差别形成了农村家庭内劳动性别分工,农村女性向上流动受到“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限制(张世勇,2013;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 46 – 131) 。积极的看法认为,这些经历过工业化洗礼的返乡女性农民工兼具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因子,她们在村庄中扮演积极的社会角色,在家庭内成为新型的家庭妇女,以自身的生活方式带动农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孟宪范,2010; 刘霞,2014) 。

而当县域成为乡村发展的聚集点,数字就业中心的女性返县发展的动力中,除了个体发展的选择外,还存在另一条隐含的脉络,即生命周期中的责任与依赖。基于以上生命历程中各个阶段女性与家乡和亲人间的依赖与需要,家庭角色和家庭责任具有无可撼动的重要性,是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更是其甘之如饴的甜蜜负担。

欠发达县域数字就业的落地,为这些有重要人力资本、渴望成为职业人的妈妈提供了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为这些“回到县城工作”的女性提供了就业和生活两不误的新型城镇化生活方式。这有力地改变了其传统“双重边缘人”“候鸟式”和“留守妈妈”的身份,使她们成为新一代有工作的县城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的成功转移和农村女性向上的阶层跃升。

五、欠发达县域数字就业赋权女性发展

数据显示,在县域数字就业中心,女性从业者达到 60% 以上,女性是数字就业的主要受益群体。通过调研发现,数字就业对县域女性就业群体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弥合性别数字鸿沟的可及性与使用性,而是在社会维度上更加多元与深远。

(一) 劳动报酬与社会保障

从国际劳工组织的倡导看,实现体面就业能够让人感受到尊严。从事数字就业为县域女性在经济上带来相对稳定收入,有利于家庭稳定发展; 在社会生活上带来丰富的社交和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

问卷数据显示,在数字就业中心有 22. 5% 的女性签订了劳动合同,并有基本劳动保障。其他情况为劳务合同,没有保险。除了企业现阶段境况原因,还有部分原因是“上保险”需要员工自己交一部分费用,有些员工更倾向于选择将此部分费用直接拿在自己手里。

从表 2 可以看出,第一,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 工作收入可观,最高月均收入达 6 000 元以上; 第二,多数地区的工作收入远高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 第三,因工时差异/工作量差异,收入存在差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业务一般为 8 小时工作制,而客服业务可以居家工作,一般工作时间为 4 小时,两者工资因工时不同而差

表 2　2022 年 3—12 月数据中心在线客服及数据标注业务月平均收入　单位: 元

数据就业中心	在线客服月平均收入	数据就业中心	标注业务月平均收入
A	1 271	C	796
B	1 307	G	1 935
C	1 415	B	3 791
D	1 569	D	3 804
E	2 172	K	3 962
F	2 650	L	4 618
G	2 854	M	5 032
H	3 345	N	6 273
I	3 664		

距较大; 第四,根据问卷调查发现,已婚已育女性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她们大多比较珍惜这份工作。

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80% 以上的女性从业者对数字就业感到满意,这一比例比男性高近 10 个百分点。从进一步的数据分析看,女性更高的满意度主要表现在: 90% 的女性认为目前的数字就业使她们的生活质量获得了改善,93% 的女性认为这份工作使其经济上得以自主与独立。

(二) 性别和家庭友好型的工作环境

在欠发达县城中,主流的就业机会主要体现为体制内工作和市场化的传统服务业,前者机会稀缺而返乡女性很难获得,后者由于收入过低等原因而成为不得已的选择,而数字就业这类与互联网相关的工作有重要的现代性的符号意义,在经济收入和工作形式方面都被认为优于传统服务业,是一份有尊严和体面的工作。与此同时,数字就业中心致力于“性别和家庭友好型的工作环境”,每个就业中心都有“女性之角”,为女性提供姜茶、卫生巾等基本福利,并基于对从业女性就业与家庭兼顾需求的考虑,不仅在工作时间方面提供较为弹性的安排以方便员工接送孩子,还在办公地设立了“儿童活动室”。

> 生了老二,工作停了一年半。然后感觉就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流,老是在家里面待着,天天拿着手机。我们社区全都是搬迁户,然后在社区里政府关心搬过来的居民就业问题和生活问题,当时(接受) 培训一个多星期就来这里(工作) 了。我们公司女性蛮多,做妈妈的也多。能够不让孩子经历留守,就非常好了。现在是(学校) 假期,我带了两个孩子上班。这个工作确实帮到(了) 我,我在公司工作了三年。(CX,2022 年 7 月访谈)

父母可以带着孩子上班,极大地缓解了女性抚育的后顾之忧。调查时正值暑假期间,可以看到儿童活动室里在做作业和玩耍的孩子,并有专业的照料人员看护。数字就业女性对这种工作环境有高度的认同和评价,好评率达 95% 。

(三) 提升家庭地位

对于重新有一份有酬工作,数字就业女性感受到重新获得了经济自主权和独立性。90% 以上的女性赞同这份数字工作使她们获得了经济自主与独立。不少女性表示,因为自己挣钱,“可以给孩子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给自己购买衣服与化妆品也不必再考虑丈夫或家人的态度。

就业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在改善了家庭整体生活之外,亦带来了家庭内部性别平等状况的改善。在家务分工方面,有 44. 1% 的县域女性认为目前的数字就业减少了她们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

在家庭地位方面,40. 3% 的县域女性认为目前的数字就业提升了她们的家庭地位。

> (我的工作) 能顾到家,家庭的经济水平能提高一点。2021 年我们在旁边买了一个房。压力有点大,因为两个小孩,再加上房贷。首付十万(元) ,后面每个月付两千多(元) 。所以现在必须两个人一起上班。家里的大事可能我稍稍比我老公要拿主意一些,他是安于现状的那种,我(是) 觉得要逼自己一把的那种。像我现在买房子的事,他觉得有得住就行了。我(觉得) 家里有两个小孩,再大一点真的住不下。他感觉压力太大了,我就说没压力,那个钱存着真的是不值钱的。(CX,2022 年 7 月访谈)

综上可以看出,在受到传统文化影响更为明显的县域,数字就业给县域女性在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与角色带来了新的可能。

(四) 拓展社会资本

数字就业可以帮助女性突破家庭中有限的人际互动边界,拓展自己的社会网络,发展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本,成为其应对挑战、促进个体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有 59. 4% 的女性认为数字就业使她们重新融入社会。

重新融入社会,不仅意味着县域女性从自我否定、怀疑中成功走出,而且意味着她们开始重建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58. 5% 的县域女性认为目前的数字就业扩大了她们的社交范围。

> 其实这个工作对我这种家庭主妇而言,是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孩子今年 2 岁半,我选择出来工作。一个是家庭地位,一个是要有自己的事情干。必须要有自己的事情干,这样才不能丢失自己。辛辛苦苦上一场大学,然后创业,轰轰烈烈过了那么多年,突然一下平淡了,确实接受不了。但是公司平台(给了我) 这么个机会,让我重拾当年工作的状态。(工作中) 其实就是每天不停地思考,每天遇到不同的人,给我们不同的人生感悟,你可能遇到一个不停地发牢骚的人,然后思考这样是不好的,我可能也是这样的,也在自我反省。也有跟社会的一个衔接,朋友圈子的改变。最起码你来这里,你会有新的同事,这些同事里面你可能会有志同道合的。你心情不好,

他会和跟你说两句,解解乏、解解闷,挺好。闲了一起吃吃饭什么的,慢慢圈子就大了。从带孩子两年,我可能就慢慢有点自卑了,有点社恐。这是我最大的改变,从社恐慢慢走出来了。(SX,2022 年 7 月访谈)

在这方面,数字就业中心同样会提供相应的资源和支持,如通过组织内的小团队建制和有规划的团队活动来帮助数字就业女性建立起同事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她们重新融入社会提供最基本和最便利的支持。

(五) 实现自我价值

调研发现,不少已婚已育女性因生育而在家待业多年,普遍存在与社会脱节的现象,自我封闭与情绪消沉。进入数字就业岗位以后,她们重新融入社会,在工作中建立新的朋友关系,内心也从封闭、自卑与抑郁走向了开放、自信与乐观。超过 70% 的县域数字就业女性表示“从事目前的工作,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了”。

在内在的价值感之外,数字就业还促使县域女性拥有了在工作中更广泛的决策弹性空间,有利于促发其对自身工作的拥有感和个体发展的掌控感。数字就业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任务完成为导向,工作者具有相对的自由与弹性。有 91% 的女性认为她们在工作中有较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她们可以有效地控制工作: 工作速度与总量、工作时间与地点、工作任务与需求等方面可以自己做决定。

帮这个客户解决了他的问题以后,他给你感谢、谢谢。很满足,很有成就感。我们能看到一天你有几个差评,我都会分析那些差评的原因,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力。当一个人跟我说“谢谢”的时候,我觉得我把他的事情解决了,我办到了,尽了自己的努力了,所以还是挺有成就感的。(SX,2022 年 7 月访谈)

在职业的外在价值方面,从事数字工作的县域女性经常因为能在工作中帮助他人而感到高兴。比如数据标注,县域女性会经常在实地发现某条道路、某座建筑或者某个指示牌与自己当初的标注工作有关,她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在为城市建设做出微薄但不可或缺的贡献; 又如云客服,县域女性经常会为帮助顾客解决问题而感到高兴,尤其在得到顾客的积极反馈之后。对她们而言,工作的意义既包括收入提升、家庭生活改善,还包括社会意义,近一半(47.9%) 的县域数字就业女性认为她们的工作能够帮助到其他人。

即便大部分县域女性返乡的原因是基于“家是唯一的答案”的家庭责任,但在家庭和个体职业发展之间,仍然存在着群体内的异质性。几乎所有被访者都认为,女性婚后必须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女人一定要有一份工作,不管你是挣 500(元) 1 000(元),还是 3 000(元)。不光是一份收入,对自己的心理也有一点影响。有事的话,可以跟同事们说一说,聊聊天什么的,心里没有那么郁结。(XX,2022 年 7 月访谈)

虽然家庭责任是返县女性的核心使命,但工作带来的社会性对这些女性来说格外重要,数字就业使县域女性能够以一种更加自主和自在的姿态做到承担其家庭角色的同时保留自我实现和职业发展可能。

综合来看,虽然相关数字就业项目的直接目标在于弥合性别数字鸿沟,从就业和经济角度直接推动县域女性发展,但通过对项目受益群体的深入调研,可以发现数字就业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的作用不仅表现在技术层面使用鸿沟弥合的直接影响,更从工作中的组织形式和企业文化层面在社会资本、家庭性别分工、主体意识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间接影响。

六、结论与讨论

(一) 性别数字鸿沟的弥合: 数字就业赋权女性发展

基于调研材料,本文认为,数字就业项目的受益人群是明确的,即欠发达县域具有中高教育背景的女性劳动者,特别是已经结婚生育、基于传统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担负家庭抚育责任而被县域就业市场排除在外的“宝妈”们。因此,数字就业助力边缘女性群体发展、弥合性别数字鸿沟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数字就业使她们摆脱了因家庭责任束缚而只能以休闲、消费为目的使用数字技术,从而可以进一步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利用数字技术获得经济收益,与其他群体一样拥有了分享数字经济红利的机会。

但在对县域女性影响的结果方面,仅用既有的可及性、使用性等数字鸿沟的直接影响框架显然已经无法完整呈现这一弥合作用,特别是考虑到本文在前述分析部分所呈现的数字就业在家庭地位、社会资本、自我价值等多维度、多层次的赋权影响,使我们看到性别数字鸿沟弥合的间接影响在社会后果方面的成效。数字就业使欠发达县域女性不仅在技术使用技能、经济收入方面有所提升,更在个体、家庭、社会等多个维度获得了赋能与发展,因此数字就业产生了全方位、多维度的社会影响。

此外,需要看到这些影响的产生并非单纯基于技术的使用,还需要叠加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践行的工作文化和管理理念,正是这种“性别和家庭友好型工作文化”在项目中的实施,才使得原本可能内嵌性别偏见的数字就业转变为性别友好型的工作,从而使得相关从业女性获得多个维度的成长与就业的良好体验。

与此同时,在更宏观的社会后果方面,助力欠发达县域女性的发展本质上也是对欠发达县域现代化、城镇化发展的推进。在这些女性身上正出现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转型,她们从传统的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打工转向在县城落地扎根的生活(焦长权,2022) 。这些有城市工作经验和较高学历的年轻人正成为县城重要的人力资本,女性的数字就业为县城发展带来了活力,形成了新型的“县城社会关系”和“县城生活方式”。这一策略正在逐步替代改革开放早期农村成年夫妇外出打工和老弱妇孺

留守乡村的拆分型家庭生活模式。由于女性在就业、家庭双方面责任的凸显,县域女性对扎根县城的策略选择、发展路径和具体安排等各个方面均表现出了主体性和能动性,正是县域女性基于自身所面临的双重责任而做出了两全策略安排,才真正推动了这种全新县城生活方式的诞生。更为可贵的是,她们不仅是这种策略的决策者,更是日复一日真实幸福生活的实践者。数字就业的适时推进,以开放、包容的就业岗位为县域女性提供了在个人发展和家庭责任之间保持兼顾平衡的实践契机。

总之,数字就业不仅解决了县域发展中就业结构在经济层面的现实问题,更以发展性和系统性的战略视角,基于县域女性的双重责任,通过对项目框架的多维度建构,引领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新型模式。在性别数字鸿沟弥合的视角下,可以看到更加深入和持续的数字就业的社会影响成效,是全方位助力女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这并非传统意义上仅从技术或经济维度着手的数字就业、创业策略所能达到的,而是需要将性别与家庭友好等积极的工作文化和管理模式整合到数字就业当中,也有必要成为性别数字鸿沟弥合的实践与分析框架的核心维度。

(二) 欠发达县域数字就业的政策意涵

1. 县域数字就业女性赋能的进阶

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深切地感受到了数字就业给县域女性带来的独立、自主和自信,女性群体自身也在访谈中充分地表达了对项目的感激和赞赏。能够就业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已经使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改变。与此同时,一部分女性特别是发展型群体也提出了自我提升的需求和对未来发展的期待。一方面,她们在就业过程中获得了自信,发展出了对职业晋升的憧憬;另一方面,她们也意识到自身在学历、能力和资源方面的局限性,因而对未来的发展存在着既向往又迷茫的心态。因此,数字就业以赋能女性为核心目标,在探索阶段基本达成了吸纳和稳定县域女性就业的目标之后,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回应和引领她们提升自身能力推动职业进阶的需求。

2. 分阶段分人群逐步解决数字就业的社保问题

社会保障既是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又在县域民众对工作岗位的评价体系中占据仅次于编制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工作中的社保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法律框架的客观要求,更是构建县域多元就业体系和体面劳动的主观诉求。

基于本项目的数据,近 80% 的县域女性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无社保合同。分年龄段来看,“00 后”中有九成(90.1%)的人没有社保;“90 后”中近八成(75.8%)的人没有社保;“80 后”中八成左右(79.5%)的人没有社保;“70 后”中四成(40.0%)的人没有社保。数据也显示,除收入以外,社保对县域女性的吸引力非常大,72.6% 县域数字就业女性表明如果有社保愿意一直从事现有工作。因此,社会保障不仅是法律框架的要求,更有利于劳动者的可持续就业。

由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与雇佣关系长期保持紧密联系,目前数字就业项

目中相当一部分岗位的灵活就业性质并不具备建立雇佣关系以及社会保障的可能。同时企业目前的经营能力和盈利状况也不具备为所有劳动者购买社保的经济基础。因此,建议将社会保障纳入未来发展的规划中,有步骤、有重点地解决数字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例如,针对发展型县域女性,即那些以近乎全职身份加入数字就业中心而且谋求在企业中晋升与发展的县域女性,可以考虑逐步将其纳入企业管理梯队,并且和她们建立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 对于兼顾型县域女性,尤其是 45 岁以下的兼顾型县域女性,可以考虑把社保作为工作业绩奖励的重要方式,让她们积极投身于数字就业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中。也可以考虑依照国家既有的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政策,积极引入县域试点,让劳动者暂时以灵活就业身份加入社会保障计划,同时企业与县一级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对其给予补贴。

3. 推动完善欠发展县域的基本公共服务

问卷数据显示,74. 2% 的县域女性愿意留在县城发展; 且在不同年龄段,愿意留在县域发展的女性都占大多数。“00 后”中,离开与留下的比例各占一半。“80 后”“90 后”中,有八成左右的女性想留下。“70 后”中,有九成的女性想要留在当地。但是,仍然有 25. 8% 女性想离开。其中,未婚女性向往大城市是因为那里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更好的生活质量; 已婚已育女性不愿意留下,是因为大城市意味着更好的教育资源,她们想要离开是为了下一代。数据显示,超过半数(51. 3%) 的县域数字就业女性认为县域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一般。

因此,数字就业在县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企业或产业的变革,地方政府也必须承担起责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范畴,使得返乡的县域青年“回得来”更“留得住”,在县城乐业安家,扎根乡土,从而进一步为县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前提和基础。

4. 推动更多的企业积极参与县域发展的公益事业

研究发现,“AI 豆计划”达到了助力欠发达地区女性就业和发展的目标,是一项可推广的事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表明,只有紧密地与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助力社会公益目标,并能在实践过程中培养和发展更多的社会企业。

总之,女性数字就业项目落地欠发达地区,借助了数字经济可打破传统工作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为县域女性开辟了新的生计之路,改变在现代经济生产体系中女性的边缘化地位; 这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实现了企业、政府、社区和女性共同参与,助力以家庭为基础的社区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积极探索与尝试。

[参考文献]

风笑天,2006. 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 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人口研究(1) : 57 – 60

韩文龙,刘璐,2020. 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 财经科学(1) : 67 – 79

焦长权,2022.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上半程与下半程.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22 – 39

刘霞,2014. 选择与规制之间: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返乡调查. 青年探索(2):5 – 10

马健因,徐昊楠,2017. 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变化轨迹及影响因素——对厦门市外来女性的案例分析. 管理观察(11):94 – 96

孟宪范,2010. 回流农民工的变化——基于对返乡打工妹的考察. 江苏社会科学(3):85 – 92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a. "短工化": 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六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 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六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谭琳,苏珊·萧特,刘惠,2003. "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 社会学研究(2):75 – 83

谭深,2005. 外出和回乡: 农村流动女性的经历. 农村·农业·农民(10):8 – 11

王春光,2001.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3):63 – 76

张世勇,2013. 返乡农民工研究: 一个生命历程的视角.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van Dijk,Jan,2002. A framework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1 – 7

Riccardini,Fabiola,Mauro Fazion,2002. Measuring the Digital Divide. IAOS Conference on Official Statistics and the New Economy, London

Empowering County-level Women's Development through Digital Employment from Gender Digital Divide Perspective

TONG Xin　LIANG Meng　CHEN Long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digital employment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y-level areas and examines project practices aimed at bridging the gender digital divide. Based 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considers the direct impacts of accessibility and usability within the digital divide,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primary goal of digital employment initiatives is to close the gender gap, directly advancing women's development in county-level areas through employment. These initiatives also directly affect women's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and sense of agency, serving as comprehensive drivers of female empowerment. However, these outcomes cannot be achieved through conventional digital employment or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ies focused solely on technical or economic dimensions. Instead, they require the integration of gender-responsive and family-friendly work cultures and management models within digital employment. Such integration should also be a central focus for future practices, research, and policies aimed at bridging the gender digital divide.

Keywords　Gender digital divide; Digital employment; County-level women